

写出《中国震撼世界》的美国记者

贝尔登：



杰克·贝尔登 (Jack Belden) 是一位有着传奇经历的美国记者，他于1933年至1942年、1946年至1949年两次来华，长达12年之久，深入抗日前线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进行采访报道，发表了大量反映日军残暴侵略行为和中国军民英勇抵抗的新闻报道，留下了一部与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相媲美的著作——《中国震撼世界》，以观察者角度客观回答了“中国革命为何能取得成功”。

地奔波于各大战场前线，以笔为武器揭露和打击日本侵略者，被誉为“中国战场最优秀的战地记者”。

让更多人了解新四军

在北平期间，贝尔登就认识了斯诺、爱泼斯坦等同情中国人民的外国记者，开始通过他们了解中国共产党；在武汉期间，贝尔登又结识了史沫特莱，还见到了周恩来，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38年1月，当白求恩、琼·尤恩从香港来武汉时，贝尔登和史沫特莱一起为他们接机并愉快地喝茶交谈。

1938年11月，贝尔登作为唯一的外国记者参加上海民众慰劳团，前往安徽泾县新四军总部。在途中，他被投奔新四军的青年们感动，不禁感叹：“这是什么力量吸引青年自愿奔赴艰苦的敌后游击区，冒着生命危险去战斗啊！这真是了不起的巨大革命力量，有了他们，中国一定有希望。”在云岭，他采访了叶挺、项英等新四军领导人。叶挺与其交谈时指出，“新四军和八路军的存在是由于共产党在我们民族革命、北伐以及现今的抗日战争中间积极参加，以及牺牲的结果。共产党在这些军队里起着意识力的作用。”项英对他说，“新四军面临着人力、客观上种种限制，能不顾一切阻碍，一切极其困苦条件和限制，是凭着真正革命的牺牲精神。”新四军指战员的革命信仰、广大军民的抗日热情，给贝尔登留下了深刻印象，令他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刮目相看。

新四军武器落后、装备奇缺、物资匮乏、条件艰苦，但他们始终以苦为乐、士气高昂，是什么能让这支队伍打败装备先进的日军呢？经过观察，贝尔登指出，新四军与其他军队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政治制度是这支军队的生命线”，部队每个连都有政治指导员，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担任最危险的职务、执行最勇敢的战斗，作战时最先冲锋、最后退却。他记载了这样的场面：“政治指导员拔出毛瑟枪喊道：‘跟我来！’全速冲在前头，战士们紧随其后……”正是这种冲锋在前、牺牲在前的精神极大地提升了部队战斗力。

新四军以严明军纪作为行动准则。贝尔登观察发现，“战士在离开的时候，把门板装好，把一切弄得非常干净，还没有见过；他们跟老百姓说话时，是那样温和”。他把新四军的“三大纪律、六项要求和十项注意”翻译成了英文向外界传播，展示了铁的纪律是这支铁军的胜利之本。

贝尔登关于新四军的十余篇报道在《大美晚报》上连载，1939年结集为单行本《新四军》出版，在书中他称赞新四军是抗日的模范，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死敌，是中国未来的希望。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贝尔登在国民党国际宣传处游行示威，表达了对国民党反共罪行的抗议和对新四军坚持抗战的敬意；又将《新四军》编入《成为时局中的新四军》一书中出版，用铁的事实回击国民党对新四军的污蔑、揭露其制造分裂的阴谋。

见证中国革命的胜利

1942年至1945年，贝尔登被派往缅甸、北非和欧洲战场采访。1946年底，又第二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深入华北、华东等解放区，广泛调查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金融、宗教、卫生等方面社会情况。他采访了刘伯承等共产党领导，国民党起义将领高树勋、著名作家赵树理以及各阶层代表。1949年回国后，以采访经历写成了代表作《中国震撼世界》出版。

贝尔登在这部书中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奥秘，“共产党获得了中国人民的好感，因而能够夺取政权……共产党是靠踏踏实实争取人心，而不是靠任何夸夸其谈的政治哲学获得胜利的”“共产党比国民党更有效地赢得了人心，因此在中国获得了胜利……他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富有理想，赤诚爱国，很得人心”“共产党如果没有人民的全心全意拥护，就绝不可能推翻蒋介石”。这些论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成功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中国震撼世界》最早的中译本是1950年在香港《新晚报》上连载，1952年结集出版的，译者是查良镛（金庸）。1970年，毛泽东会见斯诺时指出，《中国震撼世界》是可以和《西行漫记》相比的。1971年，贝尔登应邀来华访问，周恩来总理曾两次接见他，1972年2月19日，还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斯诺先生追悼会。1989年6月，贝尔登在法国巴黎去世，走完了79年传奇的一生。他为让世界更加深刻了解中国、理解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木材与人类生活

□ 章林

木材是植物生长所形成的木质化组织加工而成的材料。作为地球上支持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资源，木材不仅是迄今世界公认、用途广泛的四大原料（木材、钢材、水泥、塑料）之一，而且千百年来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木材的应用与消耗

木材源自森林中的树木。一棵树从幼苗到成材，少则要三五年时间，多则要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木材作为可再生的天然材料，对于古代人们的生活和工农业生产起着很大的支持作用。

人类对木材的使用与人类自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古代人们出于对土地以及火、光和热的基本需求，消耗了众多的木材。如大规模垦林开荒，用作狩猎或耕作的工具，在家庭生活中烹饪、取暖，在社会生产中烧制陶瓷、冶金等。

木材具有重量轻、强度高、保温隔热等特点，一直是深受人们喜爱的建筑材料之一，因此人们在伐木造房的过程中也消耗了大量木材。从我国的古建筑中可以看到，木材广泛应用于宫殿、寺庙、府邸与民房建筑中，形成独特的、成熟的建筑技术和艺术体系。古代日本迁都平安京（京都）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人们在旧都城中为了营建都城和寺院，导致森林遭到滥伐。正应了那句话：“随着森林的枯竭，文明也将开始衰落。”

由于弹性好、抗冲击和耐久性等特点，木材在古代被广泛用作船筏的材料。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吴越诸国就有建造和修理船只的工场，且已具有相当规模。两汉和南北朝时期的造船工场更加宏伟壮观，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至唐宋时期以后，造船技术和工艺有了新的进展，所造船只的结构更加坚固合理。

与此同时，随着木材重要性的日益凸显，许多地方对木材资源造成了极大的消耗。如郑和之所以停止下西洋，就与当时造船使用的木

材开始短缺、造船厂获得木材的成本大大增加有关。

随着木材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森林在很长一段时间遭到盲目砍伐，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不过，如今人们已从大肆采伐消耗森林资源转向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管理和经营森林，恢复重建森林生态系统。

木材的流通与冲突

公元前3000年左右，就有大量的木材从现在的克里特岛、塞浦路斯、黎巴嫩、叙利亚、土耳其、希腊等地运往埃及的记载。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攻打西西里岛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获得更多用于造船的木材。罗马帝国为了维持自身的繁荣与强盛，不得不到当时森林资源丰富的北非、伊比利亚半岛和高卢（法国）掠夺木材。从13世纪开始，汉萨同盟的成员成为波罗的海、北海地区远距离木产品贸易的主要经营者。从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荷兰人与汉萨同盟围绕木材贸易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新航路的开辟不仅刺激了更多大船只的建造，使木材需求持续增长，而且发现了新的域外木材，加勒比海和中美洲的桃花芯木和红木，印度的黑檀、柚木、檀香木等都被运往欧洲。此外，为了种植经济作物（特别是蔗糖），大量森林被砍伐，加之蔗糖加工需要大量薪材，使得木材贸易额迅速增长、盛极一时。需要说明的是，繁荣的木材贸易与蔗糖贸易都是与殖民屠杀、财富掠夺与海外征服相伴随的。

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对木材的需求急剧增加。尤其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机器生产开始逐渐代替手工业生产，带来了木产品贸易市场的迅速扩张。其中的一项重大进展是造纸机器的发明，其主要贡献是使木材作为造纸主要原材料。

在钢材尚未取代木材的木船时代，木材作为主要造船材料是重要的战略物资，许多冲突都是为了保

护或夺取宜林地区及确保充足的木材供应而引起的。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欧洲列强之所以总是垂涎波兰，除了波兰自身的衰落与重要的地理位置之外，其作为造船厂优质木材的产地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一些国家的崛起也与获得造船木材这一战略物资有关。英国在七年战争中击败法国、获得法属加拿大后，源源不断地将加拿大的木材运至英国，迅速建立起完整的木材加工体系，实现造船木料的升级，为英国舰队称霸世界奠定了基础。

古代中国的木材贸易

世界森林资源分布极不均衡，我国虽然有着十分丰富的森林资源，但经过历朝历代持续不断的建造活动，大量木材被消耗，因此需要从异域进口木材。在较早的历史时期，受到交通条件的制约，作为大宗物品的木材只能局限在较为狭小的地域范围内流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交通技术的发展，木材逐渐成为跨区域之间的重要交易品。

日本因地理环境及气候条件适宜树木的生长，许多优质木材成为输往中国的重要商货。根据《三国志》记载，日本女王卑弥呼遣使进献给曹魏的物品中便包含“丹木”。隋唐时期，中日民间贸易开始发展起来，赴日商人从日本进口的货物中就包括楠木等木材。到了南宋时期，通过商人贩卖与僧侣捐献等方式从日本输入的楠、松、杉等木材数量大且用途广，其中以“罗木”最为珍贵。南宋高宗时，曾以日本“罗木”建造翠伞堂。另外，根据宋代赵汝适所著《诸蕃志》记载，南宋还从东南亚进口珍贵的乌木与苏木。

明代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外贸活动日趋频繁。根据学者的研究，郑和七下西洋不仅仅是为了宣扬国威，也有着确保苏木等物品供应的目的。据统计，明代，暹罗遣使中国102次，其中1387年进贡苏木10万斤，1390年又进贡苏木17万斤。在明朝与日本的勘合贸易中，

日本的勘合船所装载的货物，除了硫黄和铜等矿产资源，以及刀剑和扇子等工艺品之外，还有从南海进口的中转贸易品苏木。由于供应十分充足，苏木一度被用作折抵官员的俸禄。此外，通过工匠们的精湛技艺，从海外带回的紫檀木逐渐成为当时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到了清朝，除了与周边国家贸易之外，与欧美国家的贸易也得到了发展，其中檀香木成为清朝从美国进口的重要货物之一。进入近代以后，西方除了向我国输入大量工业品外，也输入包括木材在内的所谓“杂货类”物品。据统计，木材占当时进口商品的比重1894年为0.8%，1913年为1.1%，1928年为1.6%，不断上升。

木材与当代人的生活

气候变化是人类生存发展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我国为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随着“低碳”成为媒体的热词和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木材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与日俱增。根据学者测算，仅靠植树造林是无法实现碳中和目标的，但森林作为最为重要的生物固碳资源，植树造林能够不断提升生态碳汇能力，对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具有重要作用。

“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一条路径是材料的低碳化。木材的原料生产可再生、产品制造低能耗低污染、产品使用节能低碳以及产品利用再循环的特性，使其拥有钢材、水泥、塑料等其他材料难以比拟的优势。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绿色低碳生活成为文化风尚，木材必然在进一步的推广和应用中给当代人的生活带来新的变化。



中国古代官吏考核考察制度（一）

□ 郝玉明

建官僚制度的发展，官吏考核制度开始逐步建立和发展。

据史书记载，战国时期就应该建立了官吏考核制度。林新奇在《中国人事管理史》中，认为战国时期正式建立官吏考核制度的主要标志是“上计制度”，即将“记书”（有关簿册）逐级上报以供考核。他研究指出战国时期的“记书”包括两种：一种是年初定下的任务书或预算簿；一种是年终实际完成的政绩统计或工作汇报。随后，秦汉继续实行上计制度，在不同朝代考核制度规范与实施情况各有不同。这里重点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几个朝代或时期的考核制度展开研究，包括秦汉、魏晋南北朝、唐朝和明清等，这是出于对古代官吏考核与选拔任用制度具有紧密关系而做出的选择，分别对应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而对考核制度进行分析研究。

秦汉时期的考核制度

统一后的秦国延续了军功爵制，但为适应郡县制国家统治需要，开始探寻新的官吏选拔和考课机制，但由于秦朝存续时间较短，制度主体仍以延续以前的制度为主。直到汉代，开始建立新的官吏选拔和考核制度，实行了察举征辟制和较为明确的分步骤分层级的官吏考课制度。

秦灭六国后建立了统一的中央

集权政治体制，适应郡县制管理需要，相应地开始对官吏选拔与考核进行调整，但更多地延续了战国时期秦国的制度，即官吏选拔上以“军功爵”制为主，官吏考核上以“上计”制为主。所谓“军功爵”制，就是以军功作为战乱时期官吏选拔依据，这是针对过去依据血缘关系继位的世官制进行的改革，商鞅变法明确提出了“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正是以军功为核心标准的官吏选拔使得秦国在军事力量上达到强盛，进而吞灭六国实现统一。统一后的秦国延续战国时期秦国的“上计”制考课，即逐级上报有关户口增长、农田开垦、赋税收入、社会治安等簿册进行考核，通常是年初下达任务书或预算簿，年终逐级上报完成情况，先由郡国守相考核县令，再将各县考核情况和计簿进行汇总上报中央，接受中央主管部门的考核。此外，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各级长官还要对其属吏进行考核，皇帝对中央部门长官进行考核。可见，秦朝实行的“上计”制考课，是注重各级官吏工作业绩的政绩考核。

汉代延续了秦朝“上计”考核方式，但已开始建立专门的考课制度。西汉初期考课制度有《功令》《上计律》等，规定由丞相和御史大夫主持对中央各机构和郡府守相的考核，其中丞相负责考课工作，御史大夫负责对考课工作进行监督与核实；郡府守相负责对县令进行考核，郡县长官负责对所属地方官吏

的考核。东汉时期郡国专门设立了“上计吏”“上计掾”，专门负责平时政绩登记统计和年终赴京汇报职责。考核周期上，实行一年一小考，三年一大考。考核结束后，依据考核结果对各级官吏进行奖惩，对绩优者进行升官、增秩、赏赐等奖励，对绩差者进行申诫、杖责、罚俸、降职、免官等处罚。

汉代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加强了对各级官吏的选拔和考核管理。一方面，推行了察举征辟制，通过察举、征召和辟除等多种方式，从德才表现等各个方面，在全国范围内遴选各类优秀人才，充实到中央和地方官僚机构官吏队伍中，为实现中央集权管理奠定组织基础；另一方面，颁布专门的考课法令，加强对各级官吏进行政绩考核，通过实施分级考核加强各级官吏管理和队伍建设，为中央集权管理体制高效运转建立管理机制。汉代“上计”制考课，明确规定了重点考核“户口垦田、钱谷出入、盗贼多少”等政绩情况，突出体现了对各级官吏履职尽责情况的考核、管理和监督，也是强化对各级官吏工作业绩的一种考核。

